

论钱钟书翻译思想的西方哲学基础^{*}

蓝红军 穆雷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广东广州 510420)

摘要: 钱钟书的翻译思想在我国译论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他的翻译思想寄寓着深沉的蕴意,既吸收了西方哲学的合理元素,又有着深厚的佛道渊源和辩证内涵。本文尝试性地探讨了西方近现代哲学思想对钱钟书翻译思想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发现他的翻译思想中有着休谟哲学和哲学阐释学的基础,也体现了他对西方理性中心主义思想的反拨。

关键词: 钱钟书; 翻译思想; 哲学基础

On the Western Philosophical Basis of Qian Zhongshu's Translation Thoughts

IAN Hongjun, MU Lei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510420)

Abstract: Qian Zhongshu's translation thoughts not only absorb some rational elements of both the western philosophies and the ancient Chinese dialectics but contain deep implications of Chinese Buddhist and Taoist cultures. This paper makes a tentative study of the impacts of the western philosophies on the forming of Qian's thoughts on translation and finds that Hume's philosophy and Hermeneutics are part of the philosophical basis of his translation thoughts and that his translation thoughts are a reflection of his criticism of egocentrism.

Key Words: Qian Zhongshu; translation thoughts; philosophical basis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038(2009)12-0042-04

1. 引言

钱钟书一生倾注于学术研究,撰写了一系列视野广阔、识见独到、议论精湛的极富思想原创性和学术开拓性的论著,使得“钱学”研究成为中国现代学术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作为“钱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钱钟书的翻译思想在我国译论史上也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他论述翻译的文章主要有:1963年3月写的《林纾的翻译》(初载于1964年6月《文学研究集刊》第一册),1981年重写的《汉译第一首英语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初载于1982年香港《抖擞》第1期),1979年《管锥编》(中华书局)中《译事三难》、《翻译术开宗明义》、《译诗》、《译音字望文穿凿》等几则札记。钱钟书对翻译虽然没有宏篇巨制的探讨,但他对于翻译的重大问题于《谈艺录》、《管锥编》、《七缀集》等著作中有着精辟的论述。郑延国(2003:1)发现钱钟书对翻译的灼见还出现在其诗和诗序之中。钱氏可谓全方位地论及翻译的性质、方法、规则,以至翻译中的文化与社会功用等问题,他最具代表性的译论是在译界如雷贯耳的“化境”说,人们将之和傅雷的“神似”论一起合称为中国传统翻译思想的“神话说”。(朱志瑜,2001:3)

一代鸿儒的翻译思想自然引起了学界极大的关注,学者们多围绕“化境”开展研究,对“化境”进行文字发生学意义上的语义诠释;

争论“化境”是“翻译标准”还是“翻译理想”;结合“化境”开展翻译批评;探讨“化境”的美学价值;批判“化境”的虚无神秘,等等。此外,还有少数学者对钱氏翻译思想的现代性意义进行了挖掘,如蔡新乐(2005:5)、黄汉平(2003:4)将钱氏翻译思想与西方解构主义联系起来考察,认为“钱钟书的翻译思想从根本上来说是反传统的,他比西方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翻译学派更早地形成了一种中国式的‘解构’翻译思想”。无疑,这些研究深化了我们对钱氏译论的认识。

钱钟书翻译思想之形成是在20世纪中国这一特定的历史时空下发生的,社会结构的剧烈变化,中西文化的冲突碰撞,传统学理与现代思潮的风云流变,不可能不对学问纵贯古今、会通中西文化的钱氏带来影响。他的译论看似集中在一个“化”字之上,实则蕴意深远、博大精深,译界对其“化”字的长期多样性解读便足以证明。他的翻译思想既吸收了中国传统哲学重“悟性”和整体观照的特点,又兼取了西方近现代哲学重理性和逻辑思辨之长。从这个角度而言,已有的研究还不够全面和系统,基本没有涉及其翻译思想之所以形成的哲学基础以及其所反映出来的文化意识。中西哲学思想和文化在钱钟书身上产生的影响以及他对之的接受、批判、继承与反思都值得深入地研究。据此,本文拟尝试性地探讨西方近现代哲学对他翻译思想的形成产生的影响,希望可以提供窥钱氏翻译思想的另一个视角。

* 基金项目: 本研究得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科研创新团队(项目编号: GW2006-TA-006)及广东省重点文科基地“翻译学研究中心”重大项目资助(项目编号: 07JDXM4001)。

作者简介: 蓝红军, 副教授, 博士生, 研究方向: 翻译学研究; 穆雷, 教授, 博士,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翻译理论, 翻译教学

收稿日期: 2009-06-04(修改稿)

2 休谟哲学对钱钟书翻译思想的影响

钱钟书青年时期曾留学欧洲,精通多国语言,熟读西方经典,并一直十分关心世界各国新事物新思想,他“在一定程度上凭借着西方思想资源,实现了对传统士大夫哲学、文学思想及其治学方式的超越。”(徐庆年, 2001: 2)。钱钟书对西方哲学有着浓厚的兴趣,西方哲学史上的家家户户他几乎都“上门做过客”,甚至“曾有过研究西洋哲学的念头”(党圣元, 1999: 4),他曾发表过《一种哲学的纲要》、《大卫·休谟》、《休谟的哲学》、《约德的自传》、《旁观者》、《作者五人》等有关哲学方面的文章,分别讨论了英国哲学家休谟的思想,分析了英国新实在论者摩尔、新黑格尔主义者布拉德莱以及罗素和美国实用主义者詹姆斯、批判实在论者桑塔亚那等人的文章特色(参见党圣元, 1999: 4)。他甚至在30年代当西班牙哲学家加赛德正在著述之时就论述过其思想,在1947年发表评论辨析了英文的“存在主义”一词,提到了雅斯贝尔斯1938年出版的《生存哲学》、萨特的《存在与虚无》、卡缪的《希齐夫对话》以及克尔凯郭尔、海德格尔等人的著作(李洪岩, 2006)。甚至连我们现在所说的解构主义的“解构”(deconstruct)一词,最早还是钱钟书应人之请翻译的。(何明星, 2008: 63)

在西方各大哲学家中,钱钟书对休谟有过较深入的研究,休谟哲学对钱钟书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钱钟书撰写过的为数不多的书评中,有关休谟的就有两篇:评莱格的《大卫·休谟》和评莱尔德的《休谟的哲学》,分别刊载于1932年10月15日和11月5日的《大公报·世界思潮》(陈才智, 2008)。从书评看,“钱钟书对休谟哲学的渊源、实质、特征以及学术个性都有深入的理解和把握,并对休谟哲学研究史也相当熟悉”。(徐庆年 王敏达, 2005: 5)

休谟哲学体系中最重要也是最具特色的部分是建立在怀疑论基础之上的因果关系问题,即休谟问题,它在西方近现代哲学史上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几乎重大哲学原理、哲学流派和哲学转折都发源于对休谟问题的研究和再认识”(张华夏, 1998: 6),直到今天休谟问题仍然是西方科学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休谟贯彻经验论观点,对感觉之外的存在和外部世界的客观规律性持怀疑态度。他看到了经验知识的片面性和局限性,虽然承认“每一个有开始存在的东西也都有一个原因”,但认为“因果关系的发现不是凭借理性,而是凭借于经验”(张志林, 1998: 78)。人们日常生活使用的因果关系原则不能以理性证明其客观必然性,因果关系的必然性只存在于我们的思想之中,是人们经过长期的经验积累把近似关系和接续关系想当然地认为是因果关系,并把前者称为原因把后者称为结果。

钱钟书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休谟哲学的因果观,尽管他并不认同休谟关于因果必然性的主观主义观点,但是休谟对于“人类经验并不能告诉我们客观世界的必然联系”(周晓亮, 1999: 159)的观点,对于人类理性能力可以帮助人们认识客观世界中的因果关系的质疑,使钱氏走出了俗世因果决定论,并且抛弃“主观独断”走向“合理怀疑”。钱钟书对西方理性主义的否定(罗新河, 2006: 4; 2007: 1)和他在学术研究中权威或固有观念的质疑都体现了“怀疑主义”在钱氏心中的影响。钱钟书一方面提出“化境”为翻译的“最高境界”,另一方面又认为“化境”是“不可实现的”,这实际上与休谟承认外部事物的客观规律性的同时又认为这种客观规律性是超乎于人的理性认识之外有着同样的“怀疑”色彩。在休谟看来,尽管物体存在不可知,但是人们对物体存在却又有着不可动摇的信念。钱氏也认为,尽管化境不可能实现,但人们对之的追求却始终不渝。

钱钟书根据这种因果关系的认识,批评了我国文论中曾经流行的“社会造因说”(钱钟书, 1997: 483),并主张在历史研究中区分“史的事实”与“史家的事实”(钱钟书, 1997: 140),还提出要善于从传统之中发现“现在性”,从现在的东西中寻找传统的“因子”,认为人们对传统的诠释与评价无不受影响于现实的认识条件,而传统资源无不可以被利用于当下的文化建设(党圣元, 1999: 3)。钱钟书继承性地发展中国传统译论,“提出了‘化境’翻译理论,把中国的传统翻译理论推向顶峰”(崔永禄, 2006: 3),就表明他利用“传统资源”于“文化建设”的动因。

休谟在知识论中区分出“观念的关系”和“实际的事情”两种知识,在价值论中则区分开“是”与“应该”,认为前者可以用理性加以认知,而后者则是从情感(道德感)而来的,两者属于不同的领域。钱钟书也是严格区分“是”与“应该”或“事实”与“价值”的,他曾强调不能将“存在判断与价值判断合而为一”(钱钟书, 1997: 476)。他对翻译“化”与“讹”的解释:“彻底和全部的‘化’是不可实现的理想,某些方面,某种程度的‘讹’是不能避免的毛病。”(钱钟书, 1997: 269)这实际上就是关于翻译应然理想与翻译实然价值关系的阐述,完全可以在休谟那里找到学理上的依据。

钱钟书(2007: 194)在《汉译第一首英语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中最后有一番感慨:“西洋的大诗人很多,第一个介绍到中国来的偏偏是朗费罗。朗费罗的好诗或较好的诗也不少,第一首译为中文的偏偏是《人生颂》。那可算是文学交流史对文学教授和评论家们的小小嘲讽或挑衅了!历史上很多——现在也就不少——这种不很合理的事例,更确切地说,很不合学者们的理想和理论的事例。这些都显示休谟所指出的‘是这样’(is)和‘应该这样’(ought)两者老合不拢。在历史的过程里,事物的发生和发展往往跟我们闹别扭,恶作剧,推翻了我们定下的铁案,涂抹了我们画出的蓝图,给我们的不透风,不漏水的严密理论系统搯上大大小小的窟窿。”

现在看来,这篇文章就是用其所考证的翻译史实来注解休谟的思想,指示我们:翻译现实中的“是”往往与翻译理想中的“应该”是两码事。

3 阐释学对钱钟书翻译思想的影响

钱钟书以博学强志闻名于世,其学术研究横跨中西,纵贯古今,会通文史哲。大师对于西方近现代哲学的了解程度也许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正是钱钟书对西方哲学的涉猎使得其学术思想中有着深厚的西方哲学底蕴。除了休谟哲学之外,对他翻译思想,乃至整个学术思想形成产生重大影响的还有西方阐释学。

阐释学是一门对于意义的理解和解释的哲学,它在西方有着悠久的历史。对阐释学的现代化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有施莱尔马赫、狄尔泰、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等人。伽达默尔是哲学阐释学的创始人,他从海德格尔的阐释学出发,确立了阐释学以理解为核心的哲学与独立地位。理解的历史性、视阈融合和“效果历史”是伽达默尔哲学阐释学的三大原则(李文革, 2004: 248-174)。伽达默尔认为历史性是人类生存的基本事实,读者和文本都处于历史的发展演变之中,读者对文本的理解有其历史特殊性和历史局限性。历史性使得对象文本和读者形成各自的“视阈”,而理解就是文本视阈与读者主体视阈的拉近。任何理解者都无法消除由于时空变化而引起的两种视阈存在的差距。伽达默尔主张文本和读者之视阈的融合,从而超越两

者,达到全新的视阈。另外,伽达默尔还认为文本的意义是和理解者一起处于不断形成过程之中,理解者是在“效果历史”中理解作品。文本意义的开放性决定了文本是超越生成它的那个时代的,这也为不同时代的人们对于文本产生多样性理解提供了可能。

阐释学所关心的问题总是与翻译学所关心的联系十分紧密(许钧,2003:290)。伽达默尔可以说是“翻译哲学”的历史上最为重要的哲学家之一(单继刚,2007:38),其关于理解的历史性原则解释了人们对文本的多元理解、误读、偏见、增删和改译等现象,因为译者(理解者)会受到各种主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绝对“信”的译文是不可能存在的。而伽氏关于视阈融合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也确切地道出了翻译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文化过度现象,因为译者总是不自觉地把自已的“前有”理解带进原文世界。

“阐释循环”论是钱钟书重要的文论思想,是钱氏由讨论汉语“不X不Y”句型引发而提出的(钱钟书,1979:169—172),有学者甚至认为,钱钟书的“阐释循环”论是其整个学术思想的核心观念,不仅包括了总的纲领、具体途径、运行机制以及相应的具体方法等多个层面,而且有着坚实的学理依据(李清良,2007:43)。虽然学界对于钱氏“阐释循环”论的实质与西方阐释学的关系还存在争论^①,但可以肯定的是,“阐释循环”这一提法就是直接借自西方阐释学,钱钟书对于西方阐释学源流相当了解。由于阐释与翻译的密切联系,阐释学毫无疑问要处理翻译问题,凭此,我们便可推知,哲学阐释学对钱氏翻译思想产生过重大影响。阐释学关于翻译就是阐释的思想在钱钟书的译论中都可找到反映。

钱钟书在《论“不隔”》(1997:498)中曾有这样的表述,“在翻译学里,不隔的正面就是‘达’,严复《天演论》绪例所谓‘信达雅’的‘达’,翻译学里的‘达’的标准推广到一切艺术便变成了美学上所谓的‘传达’说(theory of communication)——作者把所感受的经验、所认识的价值、所运用的文字、或其他媒介物来传达给读者。”钱氏并没有将“信达雅”中的“达”的解释为通常人们所说的“通顺畅达”,而将之纳入“传达”渠道,这恰好契合了阐释学中所所述的阐释的任务——“把诸神的旨意传达给凡人”;“把一种用陌生的或不可理解的表达的东西翻译成可理解的语言”。(洪汉鼎,2001:2)

阐释学认为理解的历史性和两种语言之间的差异决定了任何翻译都不可能是原文所有意义因素的完全再现,亦即是说,翻译中绝对的“信”是必然缺失的。但在理解和翻译中,译者绝不能将任何原文不存在的意义强加于文本,而是要找到最好的方式使在一种语言中表达的内容在另一种语言中得到表达(单继刚,2007:55)。而钱钟书也认为,一国文字和另一国文字之间,译者的理解和文风跟原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之间,而且译者的体会和他自己的表达能力之间必然存在距离,因而翻译过程不免有“讹”,也不可能实现彻底和全部的“化”。按照他的“化境”说,理想的翻译应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内容准确,尽量忠实于原文和原作者的意图;第二,易于理解,其实质是以读者为中心,注重译文读者的理解力,确保译文自然、易懂;第三,形式恰当,既要紧密依托原文,又应充分考虑译入语规范,避免生搬硬造(聂友军,2008:40)。所以钱钟书对林纾增补删节的翻译风格并不否定,但对林纾翻译中的各种讹误现象,却予以了明确的批驳。

伽达默尔从现象学出发,重新审视了原文与译文的关系。他认为,“译文并不是原文的简单模仿,而是原文的表现与再现,是一种以原文为基础的再创造,是一种突出原文重点的解释”(单继刚,2007,

55)。钱钟书在《林纾的翻译》(1997:270)中肯定了林纾翻译价值的存在,“许多都值得重读,尽管漏译误译随处可见”,说明在钱氏的翻译观中,译文并不附属于原文,而是作为原文所是的东西继续存在,是原文自身存在的扩充,是而“坏翻译会发生一种消灭原作的效力”。

钱钟书曾多次提到伽达默尔,还将伽达默尔所说的“视阈融合”译为“读者与作者眼界溶化”。伽达默尔主张阐释者只与文本发生关系而并不与作者发生关系,文本在视阈融合中具有根本性的地位,在理解原作方面,原作者本人并不具有高于读者和译者的权威。因而伽氏注重的是阐释者与文本之间的“视阈融合”。钱钟书将“读者与文本之间的视阈融合”译为“读者与作者眼界溶化”似乎是一种错误,但钱氏的译才为世人所公认的“臻至化境”,而他的博学又不至于使之连阐释学的这一重要观点都不知道。鉴于钱氏曾认为伽达默尔和饶斯的学说“漏洞颇多”(张隆溪,2004:238),笔者更倾向于认为钱钟书是在伽氏的“视阈融合”基础之上提出的自己的“眼界溶化”之说^②。

1934年钱钟书提出“不隔”说,讨论涉及翻译理论以及文学创作两个方面。钱钟书(1997:500)说:“‘不隔’不是一桩事物,而是一个境界,是一种状态(Situation),一种透明洞澈的状态——‘纯洁的空明’,……‘不隔’并不是把深沉的事物写到浅显易解;原来浅显易解的依然浅显;原来深沉的写到让读者看出它的深沉,甚至于原来糊涂的也能写得让读者看清楚它的糊涂……”应用到翻译中,亦即,翻译应该起到一种“解蔽”的作用,使得译文读者能与原文作者的视阈到达融合。这种“不隔”的状态是翻译的最终归宿与文学的最终指向,与海德格尔的“去蔽”^③以及“非对象性的思”趋向一致(蔡新乐,2005:570)。钱钟书的“不隔”说的内涵与海德格尔思想的契合“体现出了中华文化的传统思想融会、融化最新动向中的西方现代哲学的可能性”(蔡新乐,2005:570),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表明了西方阐释学的思想对钱钟书产生的影响。

4 钱钟书对理性中心主义的反拨

自苏格拉底用“追问”的方式让人们知道了自己的无知,并佐以“知识即理性,无知即罪恶”(张志伟,2004:57)信念的灌输,西方世界便走上了理性主义求知的道路。工业革命时期科学技术的发展带来的巨大成就日益强化了人们对理性知识的崇拜和对人类自身理性认知能力的迷信,在进化论思想的推波助澜之下一步步引发了理性中心主义的滥觞。理性中心主义把理性视为先验,将理性等同于上帝,坚持思维与存在的同一,认为整个世界具有一种可以用理智把握的结构,坚信人的理性能够认识整个世界,能够把握事物内在不变的本质和规律。理性中心主义关注和寻求事物的确定性、稳定性和规律性,因而片面张扬人的主体性,以人类理性抽象的普遍性来吞食个体的独特性。在理性主义的背景之中,人在实现对于知识追求的过程中,自身也逐渐沦为了工具。

这种推崇自然科学至上的工具理性渗透进了人文社会科学各个领域,逻辑—数学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在社科领域也变得十分盛行起来。在工具理性的观照下,翻译研究慢慢放弃了以往的直觉感悟的方法,转向了对翻译文本和语言的静态结构分析,强调语言的规律性、系统性和可转换性,翻译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同时,工具理性“把语言视为理想的工具,翻译活动成了一种简单化与程式化的技术操作,译者主体也被物化,成为可以任意转换而结果不变的机器零件,因而失去了主观能动作用与创造性。”(吕俊、侯向群,

2006: 141)

钱钟书对这种理性中心主义关于人具有万能理性能力的“神话”却表现了深度的怀疑,他“不但不相信理性万能,反而在其学术作品和文学作品中,不断感叹人之渺小与无力,既无法达到对外部世界的穷尽认知,也无法真正认识自身,并且按理性设计的目标,愿望总是脱离理性力量的支配与控制,无法真正实现,因而人生充满不尽的无奈与遗憾。认为愿望总是脱离理性力量的支配与控制不断感叹人之渺小,既无法达到对外部世界的穷尽认知,也无法真正认识自身”(参见罗新河,2006:218)。钱氏这种对人之理性力量的怀疑主义也反映在他的译论思想中。

20世纪初西方哲学发生了的语言学转向(陈嘉映,2003:18),在此影响之下,西方译界将眼光从多个世纪以来对翻译的语文学意义的探讨中转移开来,开始以理性的方式系统地分析翻译的语言学问题。熟谙西方哲学、紧密关注西方学术发展的钱钟书对西方哲学这一重大动向不可能失察不闻,但他对于翻译问题的论述中,他所采用的依然是中国传统的“神秘”、“虚幻”而“有失科学性”的话语。同时,他所坚持的一些观点,如:翻译的最高理想是不可实现的;译者的体会和表达存在差距等,实际上就是对于人的语言能力的质疑,也是对于理性中心主义对达到知识的确定性加以绝对化的一种否定。易言之,在翻译的问题上,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他对于翻译中“是”与“应该”之间存在不可否认的差距的感慨,在某种程度上而言也是以事实对理性中心主义者所描画的价值世界的颠覆。

理性中心主义强调知识的系统性,无疑,钱钟书对于翻译的诸多问题都有过严肃的思考,但他的翻译思想散落在他的几则札记之中,绝无巍然体系可言,我们只能从他信手拈来的杂谈似的评论中体会他的微言大义。然而,“‘体系’对于钱钟书而言,非不能也,而不为也”(焦亚东,2008:2)。钱氏正是以实际的方式来消解理性中心主义的“体系”观。工具理性放大作为普遍的人的主观能动性,而抹杀作为个体的人的独特性和个性发展要求,人自身也异化成了实现目的的工具。钱钟书在对林纾的翻译的评价中,对于林纾普遭人们病诟的增删创作的个性不无肯定,而对林纾后期论为实现商业目的的工具时的翻译加以批驳,这也从一个侧面批判了工具理性所带来的消极后果。

钱钟书在其翻译思想中所体现的对西方理性中心主义的反拨是与其整个学术思想相一致的。这种对于盲目相信人类理性能力至上的怀疑与反思体现出他对世界和人类自身存在价值的深沉思索。

5. 结语

在如何对待中西思想和文化的问题上,有不少人陷入了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困境,而钱钟书则表现出一种清醒的头脑和一种深锐的洞察力,睿智而科学地借鉴、吸收和扬弃外来思想,“打通”与“融会”中西。他反对“重货利而轻义理”的“中体西用”,也鄙夷只知“排比欧故”以炫博识而实际上对西学义理全然不通的“鲁莽撕裂”(党圣元,1999:191)。作为钱氏学术思想的一部分,他的翻译思想中既吸收了西方哲学的合理元素,又有着深厚的佛道渊源和辩证内涵,其中所寄寓的深意赋予了我们许多探究的空间。

本文尝试性地探讨了钱钟书翻译思想哲学基础的一个方面,限于篇幅,还未涉及其翻译思想中的中国传统哲学内涵,“通变”发展的文化意识,以及“破我”对话的伦理意蕴。笔者拟另著文加以探讨,也

希望其他学者指正和加入讨论。

注释:

- ① 具体参看李清良的《钱钟书“阐释循环”论辨析》和何明星的《钱钟书“诠释循环”与西方诠释学的关系辨析》。李清良认为钱钟书的“阐释循环”是他从自己的学术旨趣和学术经历出发而形成的,与西方诠释学没有直接关系;而何明星认为钱氏的“诠释循环”是他有意识地借鉴西方诠释学理论发展中国传统诠释方法的结果。
- ② 何明星认为,钱钟书在翻译中所说的“作者”,并不是脱离文本之外的“营生处世”的作者,而是与文本互为前提不可分割的“修辞成章”的作者;与读者眼界相溶化的作者“眼界”,是“修辞成章”作者的眼界,不是“营生处世”作者的眼界。因此,钱钟书将“视阈融合”译为“读者与作者眼界溶化”,与伽达默尔强调“视阈融合”是读者与文本的融合,两者并无本质不同。
- ③ 海德格尔的真理概念“*Entdecken* (揭示)”和“*Entbergen* (去蔽)”,有学者将“*Entbergen*”译为“解蔽”,鉴于我国古代思想家荀子有《解蔽》之作,这里我们采用“去蔽”以示区别。

参考文献:

- [1] 蔡新乐. 让诗意进入翻译理论研究——从海德格尔的“非对象性的思”看钱钟书的“不隔”说[J].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5).
- [2] 蔡新乐. 翻译与汉语——解构主义视角下的译学研究[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6.
- [3] 陈才智(整理). 钱钟书先生著述系年[OL].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1280869/51/> 2008-5-19.
- [4] 陈嘉映. 语言哲学[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 [5] 崔永禄. 传统的断裂——围绕钱钟书先生“化境”理论的思考[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6(3).
- [6] 党圣元. 钱钟书的文化通变观与学术方法论[J]. 中国社会科学, 1999(4).
- [7] 何明星. 钱钟书“诠释循环”与西方诠释学的关系辨析[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1).
- [8] 洪汉鼎. 引言: 何谓诠释学[A]. 洪汉鼎. 理解与翻译——诠释学经典文选[C].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1.
- [9] 黄汉平. 文学翻译“删节”和“增补”原作现象的文化透视——兼论钱钟书《林纾的翻译》[J]. 中国翻译, 2003(4).
- [10] 焦亚东. 在旁征博引的背后——钱钟书文学批评的逻辑起点与基本向度[J]. 长江学术, 2008(2).
- [11] 李洪岩. 如何评价钱钟书[OL]. [Post: baidu.com/f/kz=108700752/](http://post.baidu.com/f/kz=108700752/) 2006-6-16.
- [12] 李清良. 钱钟书“阐释循环”论辨析[J]. 文学评论, 2007(2).
- [13] 李文华. 西方翻译理论流派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 [14] 罗新河. 论钱钟书对人类理性能力的质疑与反思(上)[J]. 船山学刊, 2006(4).
- [15] 罗新河. 论钱钟书对人类理性能力的质疑与反思(下)[J]. 船山学刊, 2007(1).
- [16] 吕俊. 侯向群. 翻译学——一个建构主义的视角[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6.
- [17] 聂友军. 钱钟书翻译实践论[J]. 中国比较文学, 2008(3).
- [18] 钱钟书. 管锥编[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 [19] 钱钟书. 钱钟书散文[M].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1997.
- [20] 钱钟书. 汉译第一首英语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A]. 海岸. 中西诗歌翻译百年论集[C].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7.
- [21] 单继刚. 翻译的哲学方面[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 [22] 徐庆年. 青年钱钟书与西方哲学[J]. 安徽大学学报(社科版), 2001(2).
- [23] 徐庆年. 王达敏. 钱钟书与休谟哲学[J]. 安徽大学学报(社科版), 2005(5).
- [24] 许钧. 翻译的主体间性与视界融合[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3(4).
- [25] 张华夏. 《因果观念与休谟问题》序[A]. 张志林. 因果观念与休谟问题[M].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8.
- [26] 张隆溪. 走出文化的封闭圈[M]. 北京: 三联书店, 2004.
- [27] 张志林. 因果观念与休谟问题[M].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8.
- [28] 张志伟. 西方哲学十五讲[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 [29] 郑延国. 钱钟书诗中论译[J]. 上海科技翻译, 2003(1).
- [30] 周晓亮. 休谟[M].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9.
- [31] 朱志瑜. 中国传统翻译思想: “神话说”(前期)[J]. 中国翻译, 2001(3).